

他是很早便进军文坛的作家，作品几乎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一举一动，都能引发关注。无论是生活中饱经磨难，还是文坛上功成名就，“青春活力”与“积极心态”几乎是这位作家在生活与创作上得到的一致评价。他说，自己的乐观源自拥有光明底色，“写作是中心。一切经验对喜欢写作的人都有意义，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 王蒙

# 『我有光明的底色』

上官云

### 面对困难不绝望

王蒙出生于1934年。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到《青春万岁》、《布礼》、《活动变人形》等，王蒙的作品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1956年，在洋洋洒洒20多万字的《青春万岁》还在修改之时，那部名噪一时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率先出版了。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王蒙高调跨入文坛，随即陷入争议漩涡。1963年，王蒙来到新疆，一住就是16年。

在外人看来，生活条件变得艰苦了。但王蒙始终认为，就是这个比较困难的时间段对他来说仍然有许多正面的东西，比如说扩大视野、甚至是锻炼身体。少年时代的王蒙身体非常差，疾病连连，“有人说我能活到30岁就不容易了。”乐观的心态支撑王蒙坚持下来。他学会了做饭、磨面，甚至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还当过炊事员，无论如何艰难，从来没有悲观到彻底垮台的境况，“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搞不垮你的。这也可以用到我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使我们对国家、民族，对自己的生活与未来充满了一种光明的期待。”这种期待构成了王蒙生命中光明的底色，同时，他也有了一种来自对自身为人、智商的自信，“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绝望过。”

### 视写作为中心

在新疆的10多年，王蒙的写作受到了一点影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那段时间内，他几乎没有有什么作品出版。王蒙坦率地承认，那会儿对写作在短期内是没有抱什么希望的，“但是喜欢写作的人有个好处，一切的经验对他都是有益的。有好事儿当然高兴，遇到不好的事儿，有无奈、悲哀，但也‘不糟践’，你的人生和历练是不会糟践的。”

“另外，在我人生的历练上，有城市生活也有农村生活；有首都生活也有边远地区生活；有汉族生活也有其他兄弟民族的生活经历。这都是用黄金也换不来的。”王蒙的话给自己的经历做出了最好的注解，“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越要给自己找到正面的东西，给自己寻找正能量，让自己能以阳光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各种遭遇。”

回到北京后，王蒙担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开始连续发表作品：长篇、短篇……令人目不暇接。那会儿，他已经是一个年过40的中年作家，并在随后的时光里历任《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等职，工作愈加繁忙。但他的创作生命却仍然是青春的，他的作品数量与质量，让很多年轻作家望尘莫及。

“写作仍然是中心。那么多的生活面儿呢，给了我写作的资源，给了我精神的力量。”提起那些成就，王蒙淡淡地回答，“至于在乐观不乐观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商量的。不乐观，那您能选择什么呢？”

### 感谢夫人助力

时光流逝，被铁凝称为“高龄少年”的王蒙在创作上又进入了一个高峰：推出《王蒙八十自述》、小说《闷与狂》以及《青春万岁》60周年纪念版……这位始终对生活饱含激情的老人身上永远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出版社公布的1600万字的创作纪录便是他的成绩单。王蒙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从事自己最喜欢的写作，有一个美满的爱情，这是我最成功的两件事，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

在王蒙的写作上，夫人单三娅给了他不少帮助。在新书《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首发式上（上图），单三娅也来到现场。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她安静地抱着衣服坐在台下，认真聆听王蒙的发言，并不时点头微笑。王蒙说，单三娅是一位老记者，比较关心文化艺术，对自己的写作提出过非常多的建议，“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交流讨论。她也有长期做编辑的职业习惯，对哪个说法有疑义便会提出来，对我是很及时、切近的帮助。”

现在的王蒙，生活平静愉快。从工作上来说，则分为写作、讲课两个部分。出于对王蒙身体的关心，在外地的很多讲学活动，单三娅都要陪着去，“在北京倒不一定了。”

工作之余，王蒙也去会朋友、阅读、娱乐、体育活动“一个都不能少”。他乐呵呵地跟记者说，自己有时候会散步、逛公园、打保龄球；还尽量争取一周游泳两次，“夏天有时候到海边去，还争取在上海游泳。”

“我也打乒乓球。虽然打得不好，但是能活动活动，推迟衰老。”这个浑身仍然洋溢着生活激情的老作家开了个玩笑，“保持青春？那是早保持不了啦！”



### “萌萌哒”的学者

熟悉王蒙的人都知道，他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并不比年轻人差。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对“神马”等一些网络流行词都了如指掌，喜欢调侃。推介新书时会“萌萌哒”讲个段子，比如解释“思而不学则殆”是“no zuo no die”。

熟悉新生事物，也关注传统文化。在对生活进行文学式浪漫表达的同时，王蒙还是一位学者，从近年起，王蒙开始研究老庄之学、研究《论语》，“作家是各式各样的，不可能都学者化。我提倡作家们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准，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懂外语，懂得自然科学，希望更多的作家认真读一些书。”

在王蒙看来，传统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能够优化人心，“使人心多一点善良、道德，多一点君子斯文，少一点野蛮，少一点小人的毛病，社会就好了。”当然，王蒙也认为，这种传统文化要和新文化结合，“也得跟全世界的先进文化接上茬儿”。同时，王蒙对文坛的现状也颇为关注。他认为，现在（文学）内容多样，那种消费性、娱乐性的东西比过去更多，同时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新媒体的东西容易推广。比如一个电视剧受众比一本书不知要多出多少，一本书有几万人阅读已经算非常成功了。传播手段也不一样。这些情况都很多。”王蒙分析，“好处是我们的文化产品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坏处是大众接受很好，但又把水往洼里拉，要拉到一个平均数，我们时时面对这个问题。”



## 脑瘫辍学 写诗两千 乡村女诗人余秀华走红

闫梦醒 刘少华

### 脑瘫却与诗歌结缘

余秀华与诗歌的缘分，也许源自一场不幸。

余秀华出生于1976年3月，由于接生员失误造成倒产、缺氧，导致脑瘫。虽然与生俱来的疾病并没有对她的智商造成损害，但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走路摇摇晃晃，说话口齿不清，生活勉强自理。从高中二年级起，她便辍学在家。现在她的家里有一个常年在外打工、年长她12岁的丈夫以及一个在武汉上学的儿子。

做饭、洗衣、扫地、喂兔、写诗、下棋，这便是余秀华一天的生活。由于身体不好，她无法从事劳作，只能在家中从事简单的家务。除此之外，便是用左手一根不灵活的手指敲击键盘，在灵感到来时写下一行行诗句。

她说，“其实我一直不是一个安静的人，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你在这个地方，你想走你想飞，但是你飞不起来。”



余秀华在家门口的田里打草喂兔子

她选择了诗歌，同时，诗歌也选择了她。由于脑瘫，余秀华的肢体动作极不协调，写下每个字都非常吃力。在学会打字前，她只有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并将左手压住右手腕，才能把字歪歪扭扭地写出来。有人分析说，诗歌是所有文体中字数最少的一个，所以她写诗，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从1998年开始写诗，她至今已写了2000多首。诗歌主题多关于爱情、亲情和生活感悟。她的十几个笔记本上，写有1000多首诗。2009年，钟祥市文友给她送来一台电脑，学会打字后，写诗方便多了。2014年是她诗兴爆发的一年，一共写了400多首诗。

在她的博客上，有网友称，读余秀华的诗歌常让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她的残疾、她不幸的婚姻、她无法摆脱的封闭农庄，和她的诗歌对比，悲情仿佛是注定的。然而余秀华对此却不以为意：“悲伤是我人生的主旋律，悲伤的时候更容易写诗，但我不是一个悲情诗人，我高兴时也写诗。”

### 不喜欢被贴上标签

新兴社交媒体与独特个人身世的结合，使余秀华成为热点人物。

去年9月号的《诗刊》杂志重点推荐了余秀华的诗歌，认为它们充满了“重量和力量”，从此余秀华和她的诗迅速进入了公众视线。写了16年诗的她，在几个月内迅速成



余秀华在卧室里翻看以前的诗歌

名。她的作品行文质朴、感情浓烈，在过去一个月的微信朋友圈中被反复分享，迅速被人熟知与谈论。余秀华的诗歌简单流畅，打动了无数读者。有人直呼余诗“超过想象”，“活得纯粹，作品才会纯粹”；有人认为，余诗有一种“将加速度的世界往回拉一厘米的美好”。

在她迅速成名的过程中，贴在她身上的“农民”、“脑瘫”、“村妇”、“草根”这几个标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余秀华没有回避“脑瘫”的事实，但她并不喜欢这些被强行赋予的标签。她在博客中写道：“我希望我写出的诗歌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臧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余秀华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诗人，诗句写得很有洞察力。他认为，余秀华看上去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从诗里还是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很有生存智慧的女性。他说，“脑瘫、农民这样的标签会误导人们对余诗的深入理解。公众应该更耐心、更善意地挖掘介绍这个诗人的底蕴。”

### 希望能安静地栖居

由于在偏僻的小村庄里写了十几年不被家人和村民接受的诗，余秀华一直渴望被认可。

所以当2014年《诗刊》重点推出她的诗，而后她被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朗诵自己

的诗歌时，她在博客中兴奋地评价这段经历：“人生到此，仿佛所有的不幸、磨难都得到了回报。我觉得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

然而，蜂拥而至的媒体还是让余秀华有些措手不及。从1月16日开始，余秀华的手机几乎一直处于占线状态，记者们络绎不绝地到她家采访，十几家出版社承诺为她出版诗集。

好在外界的狂热并没有使她迷失，余秀华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她说，媒体的记者终要散去，我的生活终归平淡，我的诗歌写作没你们说的那么好。她希望读者和媒体更多地关注她的诗歌。她希望自己的诗集能够出版，但不是一下子全出



在没有电脑之前，余秀华都是在笔记本上手写诗歌

了，而是陆续付梓，包括她以后的诗作。

正如她自己希望的那样，公众需要给她一个自由的空间，能够继续安静地、随意地写作，将一切都回归到诗的本质，而不是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新媒体的发展深刻改变着文艺评论的形态。纷繁复杂的新媒体环境对文艺评论的传统传播格局形成巨大冲击和挑战。这是文艺评论最好的时代，也是文艺评论最坏的时代；这是文艺评论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文艺评论众声喧嚣的时代；这是文艺评论真知迸发的时代，也是文艺评论泥沙俱下的时代。到底是“最好”还是“最坏”，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

——中国文联副主席夏潮表示。

●电影文化是一个生态。一部电影没有力量马上改变一个人，但如果有很多部这样的电影，如果我们的文化生态是这样的，那可能就会改变一群人。如果把伦理虚无主义和审美的粗鄙化当成电影卖钱的法宝，在这样粗俗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变得更精致、更文明的可能性就不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为。



●电影首先是艺术品，之后才是商品。所以，电影节不是一个追逐名利的场所。电影节一定要把奖项颁给那些有艺术感觉、对艺术执著、方向对的年轻导演、演员，不要浪费在所谓的明星大腕身上。注重艺术的天资，给年轻的导演、演员以鼓励，这才是电影节的真正价值。

——著名电影人冯小宁表示。

●名人故居是勾起人们历史回忆的地方，是文化传承的最好载体之一。当名人故居被油烟缭绕，被生活噪音包围，无疑是对曾经的文化符号的一种虐杀。名人故居作为城市文化名片，应该尽可能得到彻底保护。

——知名评论家韩浩月认为。

●追求真善美是艺术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们的心灵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文艺创作必须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只有倾注真实的生活体悟、真挚的情感，才能使写作有根深泥土的实在、天地相接的旷远，才能使文艺工作者真正把握时代进步脉络、体悟群众冷暖诉求，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实现文艺工作艺术价值和时代价值的统一。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高力说。

●现在文艺舞台陀螺转得眼花缭乱，评书受到冲击是正常的。从大环境看，这体现了文化的繁荣。而老书新说和旧书新评是评书发扬光大的基础。

——评书艺术家刘兰芳认为。

（曹馨月辑）

央视人物